

徐志摩論稿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裡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毛
迅
著

徐志摩 论稿

一九九一年·成都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杨 雯

封面设计:冯先洁

版式设计:徐 燕

封面题字:马继贤

徐 志 摩 论 稿
毛 迅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页 154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614—0442—5/I·67 定价:3.50 元

目 录

引论	(1)
----------	-----

第一章 从天堂到地狱——徐志摩的

人生哲学系统	(7)
--------------	-----

一、天堂的营建	(8)
---------------	-----

二、天堂的支撑	(15)
---------------	------

三、走向地狱	(21)
--------------	------

四、通往徐氏人生哲学的源头	(27)
---------------------	------

五、本章小结	(33)
--------------	------

第二章 四面为敌的不列颠崇拜——徐志摩的

政治观和社会观	(44)
---------------	------

一、仰慕与疑惧：徐志摩论共产革命	(44)
------------------------	------

二、在人性的标尺下：徐志摩论三大 主义	(54)
------------------------------	------

三、民族的破产：徐志摩的中国现实 分析	(62)
------------------------------	------

四、徐氏政治观、社会观的国际背景	(68)
------------------------	------

五、本章小结	(74)
--------------	------

第三章 徐志摩的世界——徐志摩诗情

成分的归类分析	(82)
---------------	------

一、朝山的突进	(82)
---------------	------

二、人道同情的扩大与净化	(91)
--------------------	------

三、作为上帝秘钥的美的感念	(98)
---------------------	------

四、乱风中的残苇	(108)
----------------	-------

五、 本章小结	(118)
第四章 “诗是一种艺术”——徐志摩的诗	
艺体系	(125)
一、 作为原则的艺术观念	(125)
二、 作为内部结构的四种境界	(134)
三、 作为外部结构的形式实验	(154)
四、 本章小结	(173)
第五章 康桥的胚胎——徐志摩诗风	
与英国文学	(177)
一、 浪漫的启动	(178)
二、 维多利亚渗透	(189)
三、 世纪末的悲哀	(199)
四、 本章小结	(210)
结语	(216)
附录：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历史比较	(220)
后记	(236)

引 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徐志摩的诗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早在几十年前,茅盾就曾指出:“新诗人中间的志摩最可以注意”⁽¹⁾;朱自清先生则认为:“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²⁾;左翼评论家阿英也首肯过徐志摩在新诗方面作出的“很大的贡献”⁽³⁾。此外,无论是在闻一多先生编选的《现代诗钞》里,还是在朱自清先生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徐志摩诗作的入选量之多(在前书里居首位,在后书中居第二位),充分体现出编者对徐志摩的特殊兴趣与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标明了徐志摩在当时中国诗坛上及读者心目中的难以忽视的地位。而引人瞩目本身是意味深长的,尤其是能够引起层次较高的名家学者的关注就更是如此,因为这正是每一个诗人都渴望企及但又并非每一个诗人都能够企及的境界。

然而,由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曾风靡一时的徐志摩在国内一度为人们所遗忘了。直到历史递嬗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位风云人物才得以东山再起,又一次在国内一般读者乃至评论家的眼中迅速成为瞩目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79 年起至 1983 年止,短短几年间,国内印行并畅销的徐志摩作品的全集、选集等至少在六种以上⁽⁴⁾,不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竞相登载了上百篇涉及徐志摩不同侧面的论文^[5]，徐志摩研究的资料性图书也相应问世^[6]，一时汇成了所谓的“徐志摩热”。同时，也引来了不少论者的批评和诘难。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徐志摩热”，我们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评判呢？这是一个颇费猜测的疑问。我以为，首先需要我们做的，恐怕还不是即刻抛出这样那样的匆忙结论，而是要在选择与判断之前，遏制住任何意义上的武断与草率，冷静地深思：80年代中国的“徐志摩热”的生成是因为政治的缘故，历史的误会，还是由于徐志摩其人其诗本身涵有了在较多读者心灵中产生共震的内在基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时代正在逼使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除了再次对这位为人瞩目的诗人和他的诗创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外，别无他路可寻。

正象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徐志摩非凡的天才，复杂矛盾的观点，尖锐的见解，引起了批评界愤怒的抗议或热烈的赞扬；几十年来，对徐志摩作品的评价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7]是的，徐的世界观和他的诗艺体系确是一个相当复杂、充满矛盾的实体，其中许多相悖相斥的因素似乎处在所谓的布朗运动状态之中，紊乱地碰撞、交织或渗透着。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力图赞扬他的或力图贬抑他的论者几乎都能同时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各自急需的足够论据，这就自然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超稳定地存在着。但是，除了徐志摩自身的矛盾性这一客观原由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特别是来自评论者自身的原因——促成了上述状况的形成呢？

事实上，关于徐志摩的评论早在徐志摩生前即已开始。1925年左右，以《晨报副刊》为中心，朱湘、饶孟侃、周容等著

名诗人曾多次著文^[8]，开了徐志摩评论的先河。不过，当时的评论大都还局限于对部分诗作的点评，虽不乏真切感受，但因个人好恶、智趣、情绪等的左右，评论常常缺少学术性。国内徐志摩评论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1931年徐志摩骤然逝世后直到抗战前的一段时期里。当时，以《新月》月刊、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文学》等报刊杂志为中心，陆续发表了胡适、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茅盾、穆木天、阿英、陈梦家、杨振声、赵景深、方玮德、林徽音、沈从文等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文章^[9]，对徐志摩其人其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和探讨。但多数文章属于缅怀、追忆性的散文，论及的多是对徐志摩为人的印象、感受等；偶尔触及到诗歌艺术问题，也常常流于直感的捕捉，少有理性分析的力度和深邃。真正称得上学术性研究的文字大约只有茅盾、穆木天等人的少数几篇专论。这些论者尽可能站到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尤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同情，他们对徐志摩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思想艺术上的一些复杂现象作了启人深思的评论。

在这之后，国内徐志摩评论中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留下了一段空白。直到80年代初，才又出现了第二次徐志摩评论的热潮——它是伴随徐志摩的作品的重新问世而产生起来的。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徐志摩的悲剧命运而进行的平反昭雪工作，论者更多地留意于对徐的生平、创作和思想等情况的一般性、概括性介绍，全面而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尚未真正起步。由于研究广度及深度的欠缺，加上矫枉过正等特殊原因的影响，徐志摩评论又出现了另一种一边倒的现象，过多的溢美之辞激起了不少针锋相对的文字的涌现^[10]，两种不同的观点在1983年底，基于特殊的原

因,几乎发展到对立激化的程度。这便是几十年来国内徐志摩研究的发展概貌。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港台的不少学者和一些外籍汉学家,如刘心皇、周伯乃、陈敬之、司马长风、美国的伯奇、苏联的契尔卡斯基、捷克的普实克等,也都在徐志摩研究上作了大量工作^{〔1〕}。其中,伯奇和契尔卡斯基的研究表现出了较高的诗歌艺术鉴赏力,他们对徐志摩诗歌风格特色及形成发展等问题均有深思熟虑的看法。

纵观几十年来国内外徐志摩研究的状况,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人们的辛勤劳作毕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尽管研究者们对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作了多侧面的、甚至是颇为深入的考察,然而,由于人们囿于历史的局限,尤其是囿于观念、方法及资料占有等方面的偏差或匮乏,真正全面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未能出现。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徐志摩现象所体现出的复杂性就难以进行切实的把握和阐释,这就不可能消除评论中瞎子摸象似各执一端的局面的长久存在。本书正是在着意将徐志摩评论推向深化的前提下,以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应用解析而非评传的方法,凭借资料占有的详实,在尽可能多的参照、比较和联系当中来对徐志摩的思想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面作一次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考察和研究,并在对各种现象悉心归纳的基础上,力求揭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由及不同现象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企望求取具有较大容解度(能为大多数人理解认可或宽容)的结论。

当然,笔者的兴趣绝非仅仅止于徐志摩诗歌这一有限个体,本书所有的努力都不是为了一种孤立、简单的目的。笔者的探索只是凭借徐志摩现象这个“点”,旨在引发大家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对一个较大的“面”——20世纪中国历史遗

留给我们的一些重大疑虑(包括政治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诗歌美学的问题等等)——进行一次富有意味的联想与反思,以此来反观当今的观念变革活动,反观中国现代诗歌的现状 & 前景等。而这,便是本书写作的重心所在,亦是笔者在研究格局上意欲超越前贤的重要标志。

注释:

[1]茅盾:《徐志摩论》,载《现代》第2卷第4期。

[2]转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序》,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版,P.8。

[3]阿英:《徐志摩》,见《阿英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P.142。

[4]它们是:《徐志摩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志摩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徐志摩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志摩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徐志摩诗集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徐志摩全集》(商务印书馆,香港1984年版)。

[5]主要论文有:卞之琳的《徐志摩诗重读志感》(载《诗刊》,1979年第9期)、陆耀东的《评徐志摩的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周良沛的《徐志摩诗集编后》(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徐志摩诗集》)、赵家璧的《回忆徐志摩和〈志摩全集〉》(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陈丛周的《记徐志摩》(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顾永棣的《诗人徐志摩》(载《人物》,1981年第5期)、吕家乡的《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幻灭》(载《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张学植、苏振鹭的《徐志摩诗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载《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沈从文的《徐志摩全集·序》(见商务印书馆编《徐志摩全集》)、张大雷的《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载《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等等。

[6]如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的论文集《诗人徐志摩》、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徐志摩年谱》(陈丛周编)等等。

[7][苏]契尔卡斯基:《中国新诗·论徐志摩》,载《文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

12 期。

[8]如朱湘的《评徐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两文均收入《中书集》，生活书店，1937 年版)，周容的《志摩的诗》(载 1925 年 10 月 17 日《晨报副刊》)、饶孟侃的《新诗话》(载 1926 年 5 月 20 日《晨报诗刊》第 8 号)，等等。

[9]如胡适的《追悼志摩》、梁实秋的《谈志摩的散文》、周作人的《志摩纪念》、赵景深的《志摩师哀辞》、杨振声的《与志摩最后的一别》、郁达夫的《志摩在回忆里》(以上文章均见于《新月》月刊第 4 卷第 1 期)、茅盾的《徐志摩论》(载见注〔1〕)、阿英的《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载《海风》周刊汇刊，第 6、7 期合刊)、穆木天的《徐志摩论》(载《文学》，第 3 卷第 1 号)、沈从文的《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载 1934 年 11 月 21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方玮德的《追悼志摩》(载同上)、林徽音的《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载 1934 年 12 月 8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等等。

[10]如何达的《把诗放在时代里衡量》(载《书林》，1981 年第 3 期)、草絮的《徐志摩为什么被遗忘》(载 1982 年 7 月 15 日《北京晚报》)，等等。

[11]刘心皇著有《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台湾学津书店，1963 年版)；周伯乃在《早期新诗中的批评》(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 年版)中、陈敬之在《“新月”及其重要作家》(同上)中、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年版)中，都对徐志摩作了重点评述；伯奇著有 Hsu Chih-mo's Debt to Thomas Hardy(载 Tam, Kang Review, VOL. VI. No. 1, April, 1977)；契尔卡斯基著文见注〔7〕，普实克的研究在契尔卡斯基的论述中有所介绍。

第一章 从天堂到地狱

——徐志摩的人生哲学系统

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徐志摩的思想之“杂”^{〔1〕}，几乎近于杂乱无章的地步。徐志摩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声称他的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2〕}。如果从现象着眼，我们发现他的世界观确实很难纳入某个确切的思想体系，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罗素的基尔特主义、萧伯纳的费边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观和“衣裳哲学”、泰戈尔式的人道爱、哈代的悲观主义等，都在徐志摩那里占有各自的位置，他的世界观就象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杂烩。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论述中清楚地了解到。但是，在这思想大杂烩的表象之后，各种组成因素之间有没有某种并非纷乱庞杂的内在联系呢？作为思想者的徐志摩究竟是凭借什么样的参照系、依循什么样的标准原则去选择配料，拼凑自己的思想大杂烩的呢？这正是我们急于想要揭开的奥秘。因为只有首先解决了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捕捉到徐志摩各种观念的内在联系和贯穿线索，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他在思想上的各种选择及价值取向的动因，理解他诗情变迁的根本原由，从而对这样一个繁复的对象作出尽可能公允的评判。在本章里，我们将从徐志摩的人生哲学观念入手，迈开解剖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第一步。

一、天堂的营建

爱——同情和怜悯——情感信仰——理
性调节——和与宽容——自由——人格、
思想独立——个性实现

在徐志摩的思想体系中，“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结构因素，它是徐氏人生哲学朝向理想一极的起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象徐志摩那样赋予“爱”以万能的力量，对“爱”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在他看来，“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情⁽³⁾，是人类的生机⁽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大支柱⁽⁵⁾，是人生至宝⁽⁶⁾。有了“爱”，他的生命就有了根⁽⁷⁾；“爱”的成功，便是生命的成功，“爱”的失败便是生命的失败，生命的中心与精华即是“爱”⁽⁸⁾。他不仅把“爱”视为他的幸福⁽⁹⁾，而且还视为他的“天才”，他的“能耐”，他的“动力”⁽¹⁰⁾。一提起“爱”字，他胸肋里就透着热，放着光，滋生着力量⁽¹¹⁾。“爱”能给他“勇”⁽¹²⁾。鼓舞他敢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¹³⁾；“爱”能激起他的心灵去创造、去破坏⁽¹⁴⁾，有了“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¹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非常喜欢吟诵“爱”的伟力与奇迹⁽¹⁶⁾。在长诗《爱的灵感》中，他唱道：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

爱！因为只有爱能给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
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
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
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
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如没有光热这世上
就没有生命，要不是爱，
那精神的光热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惊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这种对“爱”的至高无上的景仰，使徐志摩坚定了一种殉“爱”而死的信念。对他来说，“这爱中心的死……强如九百次的投生”^{〔17〕}。

虽然在徐志摩的笔端，“爱”常常表现为男女间的“恋爱”和“亲情”，但实际上，他的“爱心”有着相当宽泛的内涵，这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的博爱的精神。所以，他才企图以这种“爱”来扫荡侵占人们心灵的一切卑琐和庸俗^{〔18〕}，凭着“爱”的无边力量来排除种种激荡人们恶性的疯狂，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19〕}。一句话，“合理的生活，动机是爱”^{〔20〕}，“爱”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就象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21〕}。就这样，徐志摩以“爱”为基石，开始一砖一瓦地营造他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世界。

由“爱”生发开去，是对“同情”、“怜悯”等情感因素的看重，这是徐氏人道乐土中又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诗人陈梦家曾特别指出徐志摩具有与众不同的“博大的怜悯”^{〔22〕}，徐志摩自己也承认他心里“充满着……怜悯心”^{〔23〕}。当他看到某些省份民生极度凋蔽的景象时，他的血液就会骤然变冷，转而悲叹人间的不幸^{〔24〕}。当他看到穷苦的老人小孩在街角边发抖，他心里就觉得“特别的闷，差不多发愁了”^{〔25〕}。他由此写下了不少深切同情下层民众疾苦的诗篇，象《先生！先生！》、《叫化活该》、《古怪的世界》、《盖上几张油纸》等；在这些作品中，痛苦已极的诗人几乎是在乞求人们对穷人施予“同情的温暖”^{〔26〕}，渴望在这冰冷的世界里，凝结出同情的心^{〔27〕}：

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
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
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
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给他们
救度，至少也要吹几口
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
脸上，叫他们从我的手
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
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28〕}

总之，他把“同情”、“怜悯”看成是跟“爱”一样丰富而有力量的情感^{〔29〕}，他想通过“同情”来消除贫富间的差别，把富人对穷人的同情和施舍看作是拯救人类的一线光明^{〔30〕}。

有时,徐志摩又用“感情”一词来概括“同情”和“怜悯”的内涵,着力强调“感情”在人类社会中的牵联、聚合作用。他不仅自称自己是“信仰感情的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31],而且断定整个人类群体的存在就是“感情的结合”^[32]。他分析道,真的感情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33],它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靠它才能把原来分散的生命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34]。当这条线索“破烂与涣散”的时候,全社会就必须及时补就破烂,拉紧涣散的地方,这样便能维持整个社会组织“大体的匀整”^[35],人类方有希望。为此,他把“感情”誉为自己人生的“指南”^[36],呼唤人们努力加牢“感情”这一“最普通的同情线”^[37]。他要大家确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感情来维系的^[38],并希望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抽出人道同情的纤维合成强有力的绳索^[39],一句话,感情就是力量^[40]。

也许是意识到了片面强调“感情”的偏颇,徐志摩又提出过强化“理性”的观念来加以调整。他从物理学上体察到:“剧烈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41],因而他感到任凭情感的泛滥激荡是很不全面的。“感情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42],因为不经理性清滤的感情只是一注“恶浊的乱泉”^[43]。所以,他认为,必须回复理性的地位^[44],尊重理性的权威^[45],把理性当作一把解决纠纷的快刀^[46];他说他从前的种种束缚与羁绊完全是“靠理性解开的”^[47]。为了避免与他的“感情是力量”的命题相龃龉,他还力图说明“理性”与“感情”间并非全然对立的统一关系。在他看来,理智的发达并不会妨碍天生的情感^[48],人可以依靠教育的规化来消除不合理性的感情作用,同时又保存住“真纯的情感”^[49]。只有这样的人,他认为,

在动感情的时候,动人的力量才会比平常的人伟大得多⁽⁵⁰⁾。在这里,徐志摩清醒地看到了人的理智在对人的感情产生抑制作用的同时,亦有使其深沉、浓化的特殊功能。而这种在深厚的理性背景上动发强烈情感的人,正是徐志摩无意间创造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

非常有趣的是,徐志摩的西方文艺复兴式的“爱”的观念有时又变形为带有中国儒教气息的“和为贵”思想,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融洽地相交在扬和弃斗这一共通点上。他称自己是“讨人厌的和事佬”⁽⁵¹⁾,说他天性就不是“爱寡寻仇”⁽⁵²⁾。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真纯的友爱的情谊”⁽⁵³⁾,提倡所谓的 the spirit of tolerance(宽容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与自我牺牲相近的“最神圣的品质”,含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理智力量”⁽⁵⁴⁾。“宽容精神”的提出是徐志摩想以理性清滤恶浊的情感乱泉的一次尝试。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为要摧毁世上一切非理智的感情用事行为,他厌恶并反对“对人的攻击”⁽⁵⁵⁾,痛恨“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等应受到铲灭的恶劣根性⁽⁵⁶⁾。他认为私人间稀小的仇恨往往就会酿成不预料的大祸,认为酝酿怨毒是危险的事情⁽⁵⁷⁾;他希望人们拿理性来消除意气⁽⁵⁸⁾,希望人们彼此严自审验,有过共认共谅,有功共标共赏,消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愎,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⁵⁹⁾。这种以“和”为核心的宽容精神发展到极至,便是他创造的所谓“精神兄弟”的口号——“精神的兄弟是分不了家的”⁽⁶⁰⁾,他坚信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上是能够相亲相近的。通过这种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有某种相似但西味浓郁的、“天方夜谭”式的调合论,徐志摩再次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天堂——由爱心与慈善统治的世界——的诱人景